

棄、背叛與回家之路

——李永平《雨雪霏霏》中的雙鄉追認*

陳允元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生

摘要

李永平四十餘年的創作歷程，自書寫婆羅洲的《拉子婦》出發，然而自《吉陵春秋》以降，即銳意追求純粹中國性。其「中國性—現代主義」的實驗，雖在堂堂五十萬字的《海東青》到達頂峰，但也自覺自困於文字迷宮，轉而走上「回家」之路。作為「婆羅洲三部曲」第一部作品《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即為轉折關鍵。本文以其壓卷作〈望鄉〉為論述中心，探究李永平為追求「純粹中國性」而壓抑、背棄的雙重母體認同——婆羅洲與台灣的「雙鄉意識」及其追認。「懺悔與追憶」是《雨》的基調，每一則婆羅洲童年記事，都是「棄與背叛」母題的演繹。婆羅洲是生母，台灣是養母，而兩座島嶼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因日軍「南進」有了歷史上的連繫。在壓卷作〈望鄉〉，李永平不再迷戀「純粹中國性」，而是透過私人記憶、移民社會／殖民地歷史記憶的正視，肯認自己身上的混雜性，進一步追認這個被他離棄、背叛、壓抑的「雙鄉」，踏上回家之路。

關鍵詞：李永平、《雨雪霏霏》、雙鄉、「南進」、殖民地經驗

* 本文初稿以〈望鄉：被殖民經驗與回家之路——李永平《雨雪霏霏》中的雙鄉追認〉為題，於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等舉辦之「第三屆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吉隆坡，2010.08.07-08.08）宣讀。承蒙研討會評論人林建國教授頗具啟發性的建議，以及學報審查期間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細心的閱讀與指正，特此感謝。

Abandonment, Betrayal and Home Return:

The Retracement and Recognition of Dual Home Countries in

Li Yong-Ping's *Rain and Snow Falls*

Chen, Yun-Yuan

Doctor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Li Yong-Ping's novel *Rain and Snow Falls*, which is about abandonment, betrayal and home return. In Li's previous novels, he depressed his identity to dual home countries, that are, Berneo and Taiwan, in order to pursue 'pure Chineseness'. However, he found himself trapping in the prison of old Chinese words, and tried to find his way home by retracing his private/historical memories of Berneo and Taiwan. These two islands were historically connected in Japan Empire's 'Going South' during Pacific War, and both of them had experience under Japanese rules. Li has to face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e hybridity it derives, so that he can finally set foot on his way home.

Keywords: Li Yong-Ping, *Rain and Snow Falls*, dual Home Countries, 'Go South', Colonial Experience

棄、背叛與回家之路

——李永平《雨雪霏霏》中的雙鄉追認

一、前言：多鄉與排除

2003年冬天，筆者曾在東華大學與李永平（1947-）有一面之緣。李對於筆者論文〈葳蕤的恥丘——窺視張貴興雨林圖象的「性」「獸」〉的結論表示興趣——「張貴興的雨林故事在幾經重覆之後，已經流於一種空洞的敘事模式……張的雨林故事若永無止盡地寫下去，恐怕，自己也要在文字與鄉愁的雨林裡，永久地迷路了」。¹李永平問我：「那麼，張貴興接下來的創作該怎麼走？」

當時，李永平的創作正脫離純粹中國性的文字迷宮，走上另一條道路。

回過頭看，他的提問並非偶然。

2003年，李永平出版自選集《迢迢》。²這部自選集共分五輯，分別對應其來台以後³創作的五部作品：在台灣初嶄頭角的《拉子婦》（1976）、站穩文壇的《吉陵春秋》（1986），到寫作手法被視為「奇觀」的鉅著《海東青》（1992）及其續集《朱鴿漫遊仙境》（1998），再到2002年出版的近作《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2002）。自選集《迢迢》，當可視為李永平回顧三十餘年寫作經歷的一次自傳式編纂。李永平與較他年輕約十歲的張貴興（1956-）一樣，生於婆羅洲砂勞越，久居台灣，入籍中華民國。兩人皆以繁複華麗、高度美學化的文字，表現「原鄉」追尋的執著，在台灣文壇相當受到注目。張貴興在個人首部長篇《賽蓮之歌》（1992）出版後的十年間，反覆提煉故鄉記憶中的「雨林圖象」，完成其他四部以婆羅洲為主場景的長篇小說。⁴其

1 陳允元，〈葳蕤的恥丘——窺視張貴興雨林圖象的「性」「獸」〉，《中國現代文學》9期（2006.06），頁165-179。當時論文剛寫畢，尚未正式發表。

2 李永平，《迢迢：李永平自選集 1968-2002》（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08）。

3 來台之前，李永平便已在婆羅洲展開創作。第一本小說集《婆羅洲之子》於1968年集結，在馬來西亞出版。

4 包括《頑皮家族》（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01）、《群象》（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98.02）、《猴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11）以及《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09）。

宛若強迫症地對雨林圖象多次的塗銷／改寫，似乎仍無法減輕文本意識層（雨林為母）潛藏著另一個母親——文化的、血緣上的「中國」——的焦慮。⁵當自我的「檢禁」（censorship）產生作用，張貴興只能繼續逡巡於婆羅洲茂密的雨林之中，在意識底層偷渡／找尋那君父之邦的種種痕跡／遺跡。相對於一再重申婆羅洲為其故鄉的張貴興，李永平在意識上的認同對象正好相反，他棄絕南洋，狂戀中國。除了早期《拉子婦》階段書寫婆羅洲故事，自《吉隆春秋》始，如同王德威指出的：「李永平的中國併發症一發不可收拾。南洋於他反似成了遙遠的記憶」，⁶「中國原鄉、中國母親、中國文字形成了他的世界裡的三位一體」。⁷李的嘗試在堂堂五十萬字鉅著《海東青》到達頂峰，然而換來的，卻不得不自承這是一場「巨大的失敗」。⁸李永平在自選集《迴迴》的序言自道，「在作品完成後，驀然驚覺，發現自己被囚禁在自己創造的迷宮中，必須付出慘痛代價才得以脫逃」。⁹

我們可以發現，有著相似生命路徑——生於婆羅洲，以中國（文化圖騰）為夢土，卻在台灣度過大半輩子甚至入籍中華民國——的兩個人，儘管文本意識認定的「故鄉」有異，說到底，是同一種精神結構衍生的變體。當複數的「多鄉」僅被承認其一，排除即是一種壓抑、或一種離棄。壓抑衍生出自體的不滿足，而與離棄並存的是罪惡、是虧欠。張貴興思慕雨林，對中國的原初欲望被壓抑至潛意識層，然其對中國的強烈想望仍如鬼魅般，在意識無法控制的黑暗領域蠢蠢欲動。與之相對，李永平則是擁抱中國，南洋性被拋棄在遙遠

5 張貴興常在文本中有意識地明示其對婆羅洲的情感：「那個素未謀面的廣東自然不是我的故鄉，我住了超過十九年的台灣也不是，當然就只有是那個赤道下的熱帶島嶼了」。然而，張貴興的文本意識下還隱藏著另一個母親——中國。張往往避開直接敘述並運用大量的象徵，將其壓抑在文本意識底下，以隱喻或轉喻的方式呈現。陳允元，〈葳蕤的恥丘——窺視張貴興雨林圖象的「性」「獸」〉，頁168。

6 王德威，〈來自熱帶的行旅者〉，《眾聲喧嘩以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10），頁384。

7 王德威，〈原鄉想像，浪子文學——李永平的小說〉，《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1），頁246。

8 陳瓊如，〈李永平——從一個島到另一個島〉，李永平《迴迴：李永平自選集1968-2002》，頁400。

9 李永平，〈文字因緣〉，《迴迴：李永平自選集1968-2002》，頁43。

的南洋，成為一則充滿虧欠的「棄的故事」。¹⁰關於李永平對南洋性的壓抑與遺棄，林建國在〈為什麼馬華文學？〉精闢指出：

當李永平不斷強調他創作上的「仰望對象」是中國「大觀園」時，恐怕最令他尷尬的莫過於有人說《吉陵》具有南洋色彩；李永平最要否認的歷史感恐怕就是它。「南洋」是李永平出生、成長和長大後被他透過社會實踐（寫作《吉陵春秋》）所「遺棄」的世界，「南洋」對他的歷史意義再明顯不過。¹¹

林建國認為，我們一直錯估了李永平與「域外」的聯繫，以及他投注於「域外」的強烈情感。李永平試圖在純化的「大寫歷史」中切除的南洋——他的原初拓樸斯（topos），其實與作家的私生活緊密連結：「原初拓樸斯的重要，倒不在其傳記材料和經驗實證的價值，而在於它是李永平私生活之源，同時以進行式而非傳記材料的過去式存顯」。¹²當李永平寫下《海東青》，自覺囚困於僅有空洞回聲的文字迷宮，而意欲脫困，在耳邊呼喚他回家的，便是那來自遙遠「域外」的聲音。然而「回家」之路並非毫無阻礙。遠離精神原鄉——中國——而位處「域外」的李永平，為了追尋／構築夢土中的原鄉，遺棄／背叛了生他養他育他的第一故鄉：婆羅洲沙勞越。基於同樣理由，李永平也貶抑了帶他正式踏上文學之路、同時也伴他走過大半輩子的「第二故鄉」台灣。因

10 「棄的故事」一詞借用自駱以軍（1967-）詩集《棄的故事》（1995）之同名詩。該詩運用后稷降生之典故：「遙遠的父親／我見他掩面頰坐在／狼藉紊亂不辨來去的足跡之前／『為何將我遺棄？』／交遞遠去的回音／我問母親／母親問父親／妳問我／『遺棄便是足印』」，「棄的故事」是一種父不在／父不詳的狀態，對身為外省第二代的駱以軍而言，或許是「君父城邦」失落的身分與文化焦慮的體現。如黃錦樹所言，「所有的棄（或焦慮）便是對原初的棄（或焦慮）的回憶」，而「遺棄便是足印」，是文字、是詩。我在本文使用「棄的故事」這個詞，除了樸素地取其字面義：關於離棄的故事；亦有借駱以軍之外省第二代的身分情境喻李永平之意（當然，二者有各自的文化歷史語境）。在李永平及其小說情境中，作者／敘事者既是被棄者（君父城邦中國）、也是遺棄者（他的雙鄉：生母婆羅洲、養母台灣），重層的「棄的故事」不斷在《雨雪霏霏》裡上演。以上引詩，見《棄的故事》（台北：作者自印，1995），頁16。黃錦樹之評析，見〈隔壁房間的裂縫——論駱以軍的抒情轉折〉，《謊言或真理的技藝》（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01），頁348。

11 林建國，〈為什麼馬華文學？〉，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01），頁12。

12 同註11，頁15。

此，即使在表面看來是書寫台灣的《海東青》及其續篇，台灣（台北）僅僅是「一則寓言」，是夢土原鄉的「現實參照」（且是正在墮落的），是「替代之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背離。而正是因為對第一故鄉、第二故鄉的遺棄／背叛，導致的虧欠與罪惡，成為阻礙李永平回家之路的心中的「魔」。

在這層意義上，「懺悔」於是成了被李永平視為「婆羅洲三部曲」¹³第一部作《雨雪霏霏》的首要主題。事實上，每一則婆羅洲童年記事，都是「背叛・虧欠・懺悔」母題的演繹。因為：唯有真正面對自己心中的魔，才能踏上回家的路。《雨雪霏霏》裡，〈望鄉〉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篇作品。這篇書寫三名流落婆羅洲的台籍慰安婦與南洋小孩的作品，既是《雨雪霏霏》的壓卷作，也是自選集《迢迢》的最後一輯，可見其在李永平心中的份量。這篇作品不僅完整地表達了李永平對於「雙鄉」——婆羅洲與台灣——的追認；更重要的，由於太平洋戰爭時期日軍的「南進」，婆羅洲・台灣這看似毫不相干的兩個島嶼，早在李永平赴台求學的1967年之前便產生了命運的連繫。雙鄉的追認於是更進一步衍生成為對「殖民記憶」正視，同時也是對殖民地無可避免的文化「混雜性」的肯認。唯有如此，李永平才能從他的文字迷宮脫困，也才能回家，真正在與自己一同呼吸著的土地上安身立命。

二、傾聽、參照與對話：朱鴿的位置

在《雨雪霏霏》作為敘事者傾訴對象的8歲小女孩朱鴿，論者一般僅將她視為「空白的傾聽者」，並無特別意識朱鴿的人格特質與文化位置。《雨雪霏霏》裡看似僅存在著「妳聽我說」的單向傾訴，其實是一種參照／對話關係。忽略朱鴿的特質與位置，將會忽略作者埋下的諸多線索。

在《雨雪霏霏》的開頭，敘事者以一種「追憶」的口吻敘述這個曾經是他的嚮導、有一天卻突然消失的朱鴿丫頭：「多少年了，如今我若是找到了朱鴿，我只想對她說一句：『丫頭，別來無恙？』」。書中未有隻字顯示朱鴿的

13 第二、三部作皆已出版：《大河盡頭（上卷：溯流）》（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8）、《大河盡頭（下卷：山）》（台北：麥田出版社，2010.09）。

「出現」，然而敘事者的傾訴卻已開始。朱鴿的存在，正如敘事者在作品〈尾聲〉所述：「莫非朱鴿妳只是我心中創造的一個幻影，我意識深處的一個小精靈」，敘事者與朱鴿的對話，正是與他自己的對話。換言之，朱鴿便是敘事者，知道敘事者所知道的一切——包括他說出口的，以及沒有說出口的。也無怪來自南洋的敘事者，要反覆稱讚朱鴿的聰明機靈：

我為什麼老老實實告訴妳那時我心裡害怕呢？因為妳太聰明太機靈了，一顆心生了七八個竅（人家的心都只有一個竅），什麼事都逃不過妳那兩隻烏亮亮的眼瞳子。所以，有些事不如乾脆自己先招認，免得被妳這小丫頭兒逼問出來，那可就難堪囉。¹⁴

朱鴿之於敘事者，是一種類似「超我」、或自我的「檢禁」的存在。在這個不斷回顧婆羅洲記憶的敘事過程，朱鴿的傾聽並非無條件的接受，而毋寧是一種「審視」。朱鴿聰明，「一顆心生了七八個竅」，敘事者一切的所作所為都逃不過她的法眼。她的聰明是一種敏銳的直感，出於純潔，而非敘事者的老練世故。敘事者由於世故，為避免尷尬，把能招的先招了。然而那些「不能招認的」罪惡，敘事者總顧左右而言他，意欲逃避。每在這種時候，朱鴿或基於好奇、或基於無塵的心一再追問「為什麼你要這樣？」許多敘事者試圖掩蔽的答案，朱鴿早就知道了，她要的只是敘事者能夠「坦白」——誠實面對自己所犯下的錯。

若我們仔細觀察朱鴿的文化位置，就會知道朱鴿在小說中的積極作用不止於此。在敘述中，朱鴿的父親「每次心情鬱卒，就會脫掉上衣，打起赤膊，端著一盅虎骨泡高粱老酒，一屁股坐在家門口的那把老藤椅裡，邊喝酒邊望著台北街頭，扯起大嗓門高唱黃埔校歌」；¹⁵母親「傷心時總愛唱月夜愁」，¹⁶「那是一首很老的台灣民謠」。¹⁷在象徵意義上，這是外省籍（中國移居者）

14 李永平，〈雨雪霏霏，四牡駢駢〉，《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2.09），頁11。

15 李永平，〈支那〉，《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126。

16 李永平，〈望鄉〉，《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223。

17 同註16，頁221。

父親，與台籍母親的結合，一如「迢迢」二字的屬性：「既是那麼的中國，可又那麼的台灣，在老祖宗遺留給我們的幾萬個字中，也許最能代表浪子的身世、經歷和心境了」。¹⁸簡言之，朱鴿的屬性即迢迢，而迢迢正是敘事者自身身世的寫照。「迢迢」在台語讀作「tī tōu」，意指閒逛、遊玩。康熙字典有這兩個古字，然而讀音與意義皆異，相同的只有字的「形體」——文化圖騰。在語言流動的過程之中，由於土著化的作用，詞語在不同地方產生不同的音變、義變。同屬移民社會的兩地，土著化於台灣的朱鴿，與土著化於婆羅洲的敘事者，在這點上是相似的。除此之外，若以中國為原鄉，朱鴿與來自南洋的敘事者一樣，都是「失去故鄉」的一代。中國不過是一個未曾謀面的故鄉。朱鴿的位置與敘事者幾乎一致，可以說是來自南洋的敘事者的「台版倒影」：父系自中國（原鄉）移居「域外」（婆羅洲／台灣）並落地生根（文化混雜・土著化）。而她／他們這一輩，早已失去父輩的原鄉。

透過朱鴿這個「台版倒影」，理所當然地，來自南洋的敘事者藉由敘述婆羅洲的童年往事一點一點重構、重新確認——或更精確地說：透過懺悔而贖回——其南洋性。南洋性的確認，建立在對於另一缺乏南洋性者的反覆訴說，意義藉由「差異」而得以顯現。然而，李永平筆下的敘事者並不安於只做個「南洋」華人。根據〈望鄉〉裡形塑的源頭神話，敘事者具備的不僅是婆羅洲給予的南洋性，同時也有台灣給予的台灣性。因為台灣也是他的故鄉。有趣的是，朱鴿的南洋性的缺乏不僅讓敘事者藉以反身確認自己的南洋性，在李永平的安排之下，竟同時也被用以突顯這位來自婆羅洲、後來到台灣讀大學的敘事者的「台灣性」。

在〈望鄉〉裡，敘事者帶著朱鴿溯新店溪而上，找尋早已滅絕的台灣野生純種的原生魚「庵仔魚」。年幼的朱鴿完不知道這種魚的存在。然而，來自南洋的敘事者不僅知道，他在魚滅絕之前曾親眼目睹，甚至親口吃過。台灣丫頭透過來自南洋的敘事者的口述而認識台灣，是敘事者「台灣性」的反身確認。敘述者的台灣性，乃透過其台灣的生活經驗而取得。

18 李永平，〈文字因緣〉，《迢迢：李永平自選集1968-2002》，頁46。

這是一場「台灣性」所有權的微型角力。在李永平的書寫中，「台灣性」並非血緣／出生地決定論的「超驗」存在，從而不具備任何本質性與獨佔性；作為其對立面，「台灣」的本質化，正好是解嚴後台灣本土論者建構台灣主體不斷使用的排他策略。在這個層面上，移居台灣的婆羅洲華僑（且已入籍）李永平，與台灣在本土化／去中國化運動中屢屢遭受排斥與攻擊的「外省移居者及其後裔」（口號如：「滾回中國去！」），有相似的處境。若李永平將台灣視為其第二故鄉，不可能對這樣一種粗暴的排他行為無動於衷。李要說的是：台灣性不是本質與某族群的獨佔資產，而是可透過移居、土著而共有。

但李永平並不打算停止於此。他更進一步將自己／敘述者的身世，與戰前台灣的被殖民經驗連結起來。一則「原鄉神話」的胚胎，正在〈望鄉〉裡蘊釀著。

夜半，在河堤上，耳朵靈敏的朱鴿聽見河堤下的小屋傳來女人的歌聲，並馬上認出它便是台灣老歌〈月夜愁〉。朱鴿得意地說：「你不知道吧？我告訴你！」，以為來自南洋的敘事者不了解台灣老歌。然而，出乎意料地，南洋敘事者不僅聽過〈月夜愁〉，甚至懂得朱鴿所不了解、甚至無法想像的另一段台灣故事：

可妳知道嗎？小時候在婆羅洲，我就曾聽過這首月夜愁，人家說那是日本軍歌呢。妳說什麼？月夜愁是道地的台灣歌，不可能是日本歌？這妳就不懂囉。聽南洋老一輩的華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進軍南洋羣島，好些台灣歌謠都被改編成日語來唱，其中幾首變成日本軍歌，除了月夜愁，還有雨夜花。丫頭妳聽過雨夜花嗎？¹⁹

敘事者對台灣的認識，竟是來自其在婆羅洲的生活經驗。

如前所述，敘事者「台灣性」的取得，並不完全靠其移居台灣「之後」的親身體驗與知識傳播（如與「庵仔魚」的接觸）。李永平將關係的源頭更進一步地「向前」推。敘事者與台灣的关系，早在其移居台灣之前的婆羅洲時期——甚至早在他出生之前——便已建立了。包括從父輩那裡「聽來」的關於

19 李永平，〈望鄉〉，《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224。

台灣的事、以及南洋小孩自三名台籍慰安婦那兒得來的「母愛」。非常弔詭地，敘事者的「台灣性」竟因他的「南洋身分」而確立。對敘事者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南洋性也是台灣性——至少，與他的台灣性之間有相當緊密的連動關係。在日本帝國擴張的過程中，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以及向南洋發動的戰爭，將兩地命運的跡線串連起來。婆羅洲與台灣的連結，於是不僅是戰爭時期父輩的故事，同時也是戰後後殖民階段敘事者自身經歷的故事。1945年8月，戰事結束。但戰事帶來的種種傷害仍「遺留」在兩個島嶼，揮之不去。傷害的造成，加害者的離去，以及傷害的遺留，於是成為李永平小說中男性敘事者必須面對的「罪」。

三、兩種視點：一切到這裡為止／一切都還留在原地

1933年，古倫美亞（Columbia）唱片公司於發行的〈月夜愁〉，由純純（本名劉清香，1914-1943）演唱，譜曲者鄧雨賢（1906-1944），作詞者周添旺（1911-1988），在市場銷售上獲得佳績，傳唱一時。「月色照在三線路，風吹微微，等待的人那未來，心內真可疑，想味出彼個人，啊！怨嘆月暝……（後略）」，就歌詞來看，這是一首描述女性盼不著愛慕的人的悲傷情歌。朱鴿聽母親唱的即是這個版本。然而，在戰爭時期，由於這首歌「從曲首開始便以兩兩成拍的簡單短音符節奏方式進行，這種貫穿全曲的旋律為它帶來緊湊的連接感」，日本軍方僅需略做調整，即可佯為軍歌行進曲調。²⁰〈月夜愁〉於是被改寫成時局歌曲〈軍夫の妻〉，亦即敘事者的父親常聽南洋日軍唱的版本：

御國の為に 召されて （為著國家，光榮奉召）

遠く東支那海 はるばると （遙遠的東支那海）

おお 濤越えて（啊！越過波濤）

20 黃信彰，《傳唱台灣心聲——日據時期的台語流行歌》（台北：台北市文化局・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籌備處，2009.05），頁113。

緑の丘に 別れし姿（綠色之丘，離別姿影）

死んで帰ると あの言葉（視死如歸的話語）

おお 今もなお（啊！今猶在耳）

鏡のような 今宵の月に（明鏡般的，今宵之月）

君よ面影 うつせかし（映照出你的模樣）

おお したわしや（啊！好思戀）

軍夫の妻よ 日本の女（軍夫之妻啊，日本之女）

花と散るなら 泣きはせぬ（隨花飄散，也絕不哭泣）

おお 泣きはせぬ（啊！絕不哭泣）

同樣是思慕戀人，〈月夜愁〉直訴女性悲苦，道出一般大眾的心聲；〈軍夫の妻〉則是以國家權力強制介入，而挪用、改寫出的時局歌曲。其顯現出的悲壯，是為了配合國策而擬制出的「國民美德情操」：男子「為了國家」而出征，身為「日本之女」，再怎麼悲傷也不能哭泣。那是一種「榮耀」。日本軍方在原來為大眾熟悉、喜愛的曲調上奪胎換骨，作為國策宣傳，不能不說是一種掠奪。

從〈月夜愁〉到〈軍夫の妻〉，從台語流行歌到日本軍歌，搭乘軍艦，從台灣，一路傳唱到南洋。戰爭結束，「後來日本人回去了，但是是以企業家的身分回去的」。²¹ 這段歷史，台灣新生的一輩（如朱鵠）、甚至知識份子（敘事者的同學楊泰雄，南部一所國立大學教授²²）卻未曾聽聞，彷彿患了「歷史

21 詹閱旭採訪撰文，〈大河的旅程：李永平談小說〉，《印刻文學生活誌》58號（2008.06），頁177。

22 小說中，朱鵠問敘事者來台灣讀大學時有沒有跟同學說過婆羅洲的台籍慰安婦的事。敘事者說：「有。我跟外文系班上一位要好的同學楊泰雄講過，可以後我就不想跟本地同學談這件事了。為什麼？因為那時楊泰雄一聽，回過頭來也斜起兩隻眼睛，冷冷睨著我，臉上表情很古怪，彷彿責備我胡說八道，日本人怎麼可能對台灣人做出那種事情呢？」〈望鄉〉，頁250。順帶說明〈望鄉〉的版本問題。收錄在《雨雪霏霏》裡的版本，敘事者的這位同學叫「楊泰雄」，收錄在自選集《迴迴》版本則為「楊正男」。本文引用《雨雪霏霏》版本。

失憶」。然而傷害仍然持續。南洋的人記得，有家歸不得的台籍慰安婦當然也不會忘記。

一切都還留在原地，沒有處理。

被留在原地的，是傷痕，是女性。李永平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朱鴿的母親、來自南洋的敘事者的母親，或是流落婆羅洲的三名台籍慰安婦，悲傷時唱的歌——〈月夜愁〉或〈天地荒〉，傾訴的都是一種「男性缺席」的哀苦。〈天地荒〉的歌詞：「小白菜呀／天地荒呀／兩三歲呀／死了爹呀」，²³「更深無伴獨相思」的〈月夜愁〉也是。男性的缺席並非自始的缺席，而是留下爛攤子後便一走了之：

如今的阿鶯，子宮破爛，永遠不會生孩子了，沒臉回家見阿爸阿母和鄉親們。說著她就簌地流下淚來，捋起衣袖露出臂膀子，伸到太陽下讓我看她膀子上刻的一個黑色的字……「慰」……這個刺青一輩子留存在姑娘們身上，永遠洗刷不掉的！²⁴

作為侵略者的日軍在終戰之後被遣送回國，離開事發之地。至今仍有許多戰爭責任尚未被追究，包括天皇的戰爭責任，以及對「慰安婦」的後續處理。他們逃避、忘卻，而當初被誘騙到南洋卻成為慰安婦的台灣女性卻不能逃也不能忘，甚至家也回不去。她們的身心受到永久性的傷害，無法婚姻、生育，少女的夢與幸福的權利被狠狠剝奪（正是因為無法婚姻、生育，〈望鄉〉裡的三名慰安婦才會將無法實現的夢投射在這位南洋小孩身上）。臂膀上「慰」字的黑色烙印同時也烙在心裡，洗不掉，挖不去。這是一段被男性／殖民者／侵略者排除的歷史，當初誘騙她們來的日本政府不願正視，故鄉台灣也覺得羞恥。三名台籍慰安婦選擇留在南洋，既是不得不然，也是一種「自我流放」。

在《雨雪霏霏》裡，「留下傷害而逕自缺席」幾乎是男性共同的罪。敘事

23 李永平，〈望鄉〉，《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223。

24 同註23，頁247-248。

者謂他的父親「他這一生可把我母親給害慘了」：

他是個讀書人，在大陸廣東省揭陽縣老家讀完書，就到南洋找頭路，先在古晉中華公學校教書，可是教了四年，無緣無故，他說不教書就不教啦，把妻小丟在古晉城裡，自己穿著一身雪白西裝拎起行囊在婆羅洲各地迥迥遊歷三年。幸好碰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大舉南下，我父親才倉皇逃回家，後來不知怎的跟一個日本少佐合夥，在沙勞越邊疆軍事要塞「堯灣鎮」開設肥皂廠。²⁵

在敘事者的眼裡，父親是個「不務正業」的傢伙。先是丟下妻兒四處迥迥遊歷，因太平洋戰爭返家，正好與日軍少佐搭夥在軍事要塞賺戰爭財。戰爭結束，趁亂開始進出荷蘭和英國殖民地，幹起黃金走私買賣。被逮之後，恰好遭逢韓戰爆發，溜回荷蘭地界向荷蘭姘頭借錢，打算種胡椒賣給美軍做罐頭。無奈韓戰結束，行情暴跌，反揩了一屁股債讓家裡痛苦不堪。幾年後越戰開打，父親似乎又看到了一絲希望。從敘事者父親的種種「經歷」我們可以發現：對他人而言是災難的戰事，對他而言都是大賺戰爭投機之財、幹地下勾當的絕佳機會。此外，戰時其與殖民者掛勾、跟荷蘭姘頭胡搞，在在象徵了其「不忠」——對民族不忠，以及對妻兒不忠。造成敘述者母親的最大不幸者，是敘事者的父親幾乎對自己的「家庭責任」無視。他的妻子「身體不好，長年病懨懨，可孩子一個接一個的生」，²⁶種胡椒的那幾年家裡「窮得一年只吃三次肉」，妻子還是拼命生。甚至孩子（敘事者）高燒，他仍滿身酒氣回來，與妻子行房：

天還沒亮，睡夢中我好像聽見怪怪的什麼聲音——嘎吱，嘎吱——我登時驚醒過來，翻個身，冷不防我父親一個大巴掌掃了過來，火辣辣的直擱到我腮幫上：「轉過去！不許看。」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我轉過身子把頭臉蒙在被窩裡，瘧疾發作似地渾身打起擺子，抖簌簌直到天亮。

25 同註23，頁225。

26 李永平，〈第一顆石頭〉，《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78。

那當口，我聽見我媽沉沉嘆息出一聲來。那聲音啊，丫頭——²⁷

母親的嘆息，是對肚子裡即將孕育出的生命的嘆息。敘事者的父親只懂行房，行房對他而言只是一種「性欲的發洩」，對女性而言卻是「另一個生命的誕生」。慰安婦的存在，亦是為了解決日軍在戰地難以消解的生理欲望。對日軍而言，生命的誕生是不必要的，是欲望的負累。他們於是剝除了慰安婦做為母親最重要的能力——生育。一切始於性欲，而終於欲望的發洩。一切到這裡為止。對敘事者的浪蕩子父親而言，亦是如此。

日軍剝除慰安婦的生育能力，將她們的身體殖民地化，把無形的負累無限期地留在慰安婦的心裡。敘事者的父親既無力改善家境，又讓身體不好的妻子拼命地生，除了把育兒與生計的壓力統統扔給妻子，更重要的——生命的誕生，便意味著當生命的不幸繼續地延長、擴大。就女性的立場而言，並非男性的「一切到這裡為止」。而是：

一切自這裡開始。

於是，一則又一則的「棄的故事」，不斷以各種形式在婆羅洲反覆上演。

李永平筆下的男性敘事者，當然也成為其中一個主角。

四、純粹與混雜：敘事者的英屬婆羅洲認同糾葛

在李永平四十年的寫作歷程之中，「婆羅洲三部曲」的第一部作《雨雪霏霏》，也是他踏上回家之路的第一步。李永平在訪談中自云：「我寫作已經有好幾十年了，如果從《拉子婦》算起，大概也40年，在外面漂泊流浪也40年了，我想在寫作這條路上，我應該回歸我的鄉土，把我在婆羅洲20年的成長經驗做個整理、回顧」。²⁸《雨雪霏霏》是一部懺悔之作，是一部自傳式的小說。李永平離家追求他的夢土：中國原鄉——幾十載，如同王德威所說：自《金陵春秋》始，「李永平的中國併發症一發不可收拾。南洋於他反似成了遙

27 同註26，頁79。

28 詹閱旭採訪撰文，〈大河的旅程：李永平談小說〉，《印刻文學生活誌》58號，頁175。

遠的記憶」。²⁹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敘事者與敘事者的父親一樣，是個「天生的浪蕩子」。《雨雪霏霏》裡來自南洋的敘事者，透過對朱鴿敘述其童年回憶、透過懺悔，一點一點贖回那個被他遺棄許久的故鄉與童年。一切都還留在原地。他的記憶，以及他記憶裡那些久久不敢、也不願碰觸的過去。

只有真正面對心中的「魔」，才能踏上回家的路。

李永平／敘事者當初之所以決定離開婆羅洲，投入中國母親的懷抱，文化認同當然是主因。《雨雪霏霏》的敘事者對自己的中國血統感到自豪，但在朱鴿的逼問下，敘事者一步步逼近其在種族混雜的婆羅洲追逐「純粹中國性」本身的原罪：對「非我族類」的冷血、輕蔑、歧視，以及追逐本身的虛妄性。³⁰在〈桑妮亞〉裡，他對中國女孩墮落成為妓女感到無比傷心，摀住耳朵，甚至膝頭一軟，「死命掐住心口，呼天搶地嘔吐起來」。但當朱鴿問道：「如果這些女孩子是馬來人、印度人或拉子婦，你還會不會感到那樣傷心呢？」敘事者囁嚅著說：「會！只是……感覺不一樣」。³¹朱鴿的逼問，也把作者李永平逼回到創作生涯的最開端——〈拉子婦〉（1976）——那個始終棄置、沒有面對的問題。純潔而點慧的朱鴿繼續追問：「怎麼不一樣呢？為什麼不一樣？」，甚至刻意說出：「如果有一天我，朱鴿，被賣到那條黑巷當妓女呢？」，逼使在崩潰邊緣的敘事者默認其在種族問題上的雙重標準——非我族類的生命不算生命，而中國的純粹／純潔絕對不可玷污。

如果說〈桑妮亞〉處理的是生理血統上的華／非華的問題，那麼〈支那〉、〈司徒瑪莉〉所碰觸的就是華人社會內部的文化認同問題。兩篇小說都圍繞著敘事者暗戀的對象「司徒瑪莉」展開。「司徒」是這女孩的姓（廣東大姓），敘事者從沒與她談過話，不知道名，為方便與朱鴿姑且稱她「瑪莉」。正如這華洋夾雜、亦華亦洋、非華非洋的奇怪命名，司徒瑪莉有華人血統，讀

29 王德威，〈來自熱帶的行旅者〉，《眾聲喧嘩以後》，頁384。

30 這虛妄性，同樣可用在李永平對純粹中國的追逐上面：「我覺得他們太天真，夢想在別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支那烏托邦，注定要失敗的！事實證明我的看法正確」。〈一個游擊隊員的死〉，《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165。

31 李永平，〈桑妮亞〉，《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56。

的是聖瑪嘉烈英文學校，與就讀聖保祿漢文學校的敘事者除了搭公車時坐正對面，完全沒有交集，卻將敘事者迷得神魂顛倒：「這半小時的車程，丫頭哇，是我一整天中最苦澀辛酸可也最甜美的時光」。她心中的秘密他無法探知，只能不斷窺探、揣測，「吸嗅她腰枝上隨風飄漾的髮絲散發出的麗仕洗髮精香」。而讓敘事者感到苦澀辛酸的，是其對中國性的自卑。只因司徒瑪莉若有似無地睨著他，敘事者「那一瞬間，我那原本就砰砰碰碰亂跳不停的心坎兒，猛一顫抖，差點停頓。我慌忙垂下頭來，望望自己身上穿著的那套土黃制服，又看看黃布書包上繡著的『聖保祿學校』五個漢字，忽然感到滿臉火燒火燎起來，好像發高燒，連耳根都漲紅了」。³²

敘事者壓抑著的民族的自卑與自傲，在兩校一同觀看電影《北京五十五天》的場合爆發。那是一部演著「八國聯軍凱旋進入北京城」的好萊塢片，對中國多所侮辱。漢校這邊自覺受辱，靜默無聲；反觀走道右邊，聖瑪嘉烈英校師生卻興高采烈，一個勁給八國聯軍鼓掌歡呼——這當然包括司徒瑪莉。敘事者覺得受傷，由愛生恨，決定結束對司徒瑪莉的單戀。後來，上了中學後，敘事者打探發現司徒瑪莉每天放學後總愛在街上流連。那幾年，敘事者「變成了一隻獵狗，鎮日裡聳出鼻子吸吸嗅嗅，四處搜尋司徒瑪莉身上腋下飄漫出的那一股麗仕皂香」。³³「麗仕皂香」既是敘事者童年時期的性啟蒙——曾經摟著敘事者睡的小阿姨、³⁴一天洗兩三次澡的田玉娘、司徒瑪莉，也是一種南洋性的洗去：「南洋天氣熱，人們身上一早就發出濃濃的汗酸味，太陽下滿城瀰漫，膠結成一團。從小，不知怎麼我就討厭這種氣息」。³⁵而在司徒瑪莉身上，它同時也是一種西洋性——中國性的洗去的表徵。敘事者的認同是混雜的，是在不同階段、自不同來源建構的，而非他一心追逐的純粹中國。

32 李永平，〈支那〉，《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133。

33 李永平，〈司徒瑪莉〉，《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193-194。

34 同註33：「有一回我小阿姨來訪，在山中玩了一天，傍晚就在河裡洗澡，用一塊從城裡帶來的麗仕香皂慢慢擦洗身子，晚上摟著我睡。那時我還是個小男孩呢！那一整夜我都捨不得睡，可我緊閉住眼睛假裝呼呼入睡。黑暗中，我蜷縮著身子躺在小阿姨懷裡，偷偷深出鼻尖，一小口一小口吸嗅著、玩味著小阿姨腋窩中凝聚的肥皂香，心裡盼望著天永遠都不會亮。丫頭，那一夜我光著身子睡在天堂！」，頁195。

35 同註33，頁194。

這些，他當然知道。因此他必須壓抑。

後來敘事者發現，當英軍占領沙勞越，司徒瑪莉竟頻繁進出英國軍官俱樂部。英軍走後，沙勞越獨立，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個州，馬來部隊開始進駐古晉，原來淪為英國軍官俱樂部的聖安妮堡變成馬來軍官俱樂部。當敘事者撞見司徒瑪莉及她的小孩——馬來血統的嬰兒——敘事者鄙夷地在地上吐了一泡口水。李永平安排了司徒瑪莉在北婆羅洲轉變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個州的過程中墮落，露骨地表現出他在政治上對「馬來西亞聯邦」的厭惡。³⁶其墮落，當然給了敘事者一個離開／離棄／否定婆羅洲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司徒瑪莉

36 李永平接受訪談曾說：「我心目中的鄉土是婆羅洲，也許不是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橫跨馬來半島和婆羅洲北部，我生長的地方是北婆羅洲，那時是英國殖民地，叫沙勞越，我大概高中17歲的時候，馬來西亞聯邦成立了，那個國家是英國人把馬來半島的馬來亞，和婆羅洲的英國殖民地，沙勞越跟沙巴，把它結合起來弄個聯邦。事實上當時沙勞越的居民，包括華人，包括原住民都反對成立這個聯邦，因為這意味著馬來人主導整個政治。所以到現在，坦白講，我不太願意承認我是馬來西亞人，因為我根本不承認馬來西亞這個國家。這幾十年我不敢回去，就一直滯留在海外，因為我一直認為我是在英屬婆羅洲長大的。後來我就放棄馬來西亞的護照，很早，大概在1976年吧，就拿中華民國身分證」。〈大河的旅程：李永平談小說〉，《印刻文學生活誌》58號，頁175。

匿名審查委員於審查意見指正本文初稿關於李永平入籍時點的錯誤。審查意見：「查1976年李永平剛赴美深造，怎可能放棄國籍？應是民國76年之筆誤。」經筆者查閱其他訪談資料進行比對，李永平放棄馬來西亞國籍、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的時點，應係審查委員所說的「民國76年」左右。然而這應該不是採訪稿撰寫者的筆誤，而是李永平的誤記、或李進行西元／民國互換的錯誤或口誤。說明如下：

〈大河的旅程〉的採訪初稿，更詳盡地記錄了李永平對自己徙動過程的敘述：「我是民國56年到台灣的，因為我還記得我台大學號是561705，56代表56年，四年後大學畢業，然後留在台大外文系當了五年助教，然後出國，在美國待了6年，後來回到台灣教書。」民國56年即1967年，依文中資訊推估：1967-1971（4年）台大外文系時期；1971-1976（5年）外文系助教時期；1976-1982（6年）美國時期，李永平回到台灣約略是1982年左右。申請台灣護照的過程，李永平在另一篇訪問稿〈人生浪遊找到了目的地——李永平訪談錄（上）〉敘述：「從美國回台灣教書後，我開始申請台灣護照，困難重重，我太太是台灣人，照理我是配偶，應該很順利，但我花了3年時間，一直到1976年，30歲了，在台灣前後待十幾年了，才拿到台灣的護照，一拿到護照，立刻到台北市的馬來西亞代表處，宣誓放棄馬來西亞國籍，當場簽字。」從這段敘述我們可以進而判斷：一、李永平取得台灣護照、放棄馬來西亞國籍的時點不會早於1985年（返台的1982年[推估]加上申請護照的三年），接近民國76年（1987年）。故訪談稿所載的「一九七六年」係錯誤資訊。二、李永平在不同訪談皆提到時點為「一九七六年」，應是李永平的誤記、或李進行西元／民國互換的錯誤或口誤，而非採訪稿撰寫者的筆誤。

引述的兩篇訪談稿，前者由詹閔旭訪問（訪問時間：2006年11月15日），收錄於詹閔旭〈跨界地方認同政治：李永平小說（1968-1998）與台灣鄉土文學脈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引文見頁95-96。後者由伍燕翎，施慧敏訪問（訪問時間：2008年11月25日），刊載於《星洲日報》（2009.03.14），電子版網址：<http://tech.sinchew-i.com/sc/node/106020>。查閱日期：2011年9月24日。

此引用資訊的錯誤，承蒙審查委員的細心閱讀與指教，才有改正的機會。在此表達我的謝意。

的故事，不免是一則有著強烈政治隱喻的故事。作者藉由敘事者對司徒瑪莉的否定引出其對非我族類者如馬來人的歧視；但是說到底，敘事者的不敢言愛／對愛否定，無非是對婆羅洲（我們不能忘記英屬婆羅洲的殖民地性格——不平等的文化權力位階、以及不可避免的文化混雜）的壓抑。當朱鴿直言敘事者心裡其實還深深愛著司徒瑪莉，他斷然否認，且馬上連結到司徒瑪莉＝婆羅洲的象徵層次：「隨妳怎麼講，朱鴿丫頭，反正那時我已決心離開婆羅洲，回到支那母親的懷抱（當時我卻實這樣想）」³⁷。

有趣的是，敘事者這裡（且時常）使用的是「支那」，而非「中國」——「支那」是一個由日本帝國命名、在當時帶有些許歧視意味的詞語。身為婆羅洲華僑的敘事者使用這樣的詞語，可能是帝國話語的內化、或殖民地人民的刻意挪用，但在《雨雪霏霏》的脈絡中，我認為那亦是一種政治隱喻：

離開婆羅洲，敘事者即將渡海前往的不是中國，而是台灣。

一個被日本帝國殖民五十一年之久的漢人移民島嶼。

五、「你卻沒有跟她同生共死」：另一則「棄的故事」

在釐清李永平／敘事者對其出生地「英屬婆羅洲」的文化認同糾葛之後，接著要處理的是「棄」與「回家」。在《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來自南洋的敘事者的童年記憶裡，一直重複著同樣一種模式的故事：背叛／背離／離棄。在〈雨雪霏霏，四牡騤騤〉裡，敘事者與他的初戀對象田玉娘相約到婆羅洲雨林裡，尋找加入游擊隊陣亡的級任老師與師丈。田玉娘卻在達雅族人的長屋裡染上了猩紅熱，病死了。敘事者則一點事也沒有。或許這是敘事者最初的「棄」的記憶：田玉娘離棄敘事者獨自一人死去，敘事者則離棄田玉娘獨自一人活了下來。敏銳的朱鴿直探敘事者心中的禁區：

你一生最憐惜、最感到虧欠的女孩就是你這個小學同班女同學。她跟隨你在婆羅洲森林歷險，出生入死，而你，卻沒有跟她同生共死——你把

37 李永平，〈司徒瑪莉〉，《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205。

她拋棄在婆羅洲。³⁸

這是「棄的故事」的原型：在這裡，「活」於是成為一種生者不得不承擔的莫名罪惡。同樣是這個故事的延續，敘事者在〈一個游擊隊員的死〉裡提到，由於夢想在北婆羅洲沙勞越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有一天班上同學忽然消失了大半，隨老師走進森林加入游擊隊。朱鴿問敘事者怎麼沒有跟同學進入森林？敘事者先是以「因為我要念書」搪塞，後來才坦誠怕死，但仍意圖辯解。話說從頭——先是田玉娘的「死」，讓敘事者的「生」成為一種罪惡，婆羅洲雨林也因此成為敘事者心中陰濕的一塊記憶；後來，敘事者的同學大批加入游擊隊，他沒有跟進，最後也「活」了下來。在這裡，「生」幾乎是一種自私的行為，帶有原罪，就像朱鴿說的：「你卻沒有跟她同生共死」。

對作者意義極大的〈第一顆石頭〉，也有這樣的意味。敘事者家的看門狗小烏，從小與他們兄妹要好，也曾救母親一命。即使後來家裡窮，小烏「寧可吃屎、吃蚯蚓，打死也不肯投奔附近兩三戶如今還有得吃的人家」。吃了三年，「病了，長出一身疥瘡，肚臍上爛出兩個大窟窿，肚子裡那幾十根大小腸子纏絞成一窩，全都流淌出身體外面來，太陽下紅氾氾臭烘烘」。³⁹起初兄妹們天天輪流守護，然而有一次，在一種大家都不知道該怎辦的靜默中，其中一人帶頭丟了第一顆石頭，全家的孩子霎時著魔似地咒罵著用石頭把小烏活活砸死。李永平自述，這是真實的故事，是他心中一輩子的陰影。而其作品中表現出的罪惡感，是童年生活經驗形成的。⁴⁰這故事可解釋成恩將仇報，或是正好相反——因過於親密、不忍卒睹，在壓力的臨界迸發出的情緒潰堤。或是出於一種為折磨解套的意圖——小烏之所以病成這樣全是家族的罪，而殺掉小烏，是否定／終結罪的存在，將所有人（包括小烏）自此牢籠釋放的最直接途徑。然而，無論理由如何正當，敘事者畢竟親手殺了自己的至親，在意識上那仍是一種對有恩者、對至親的背叛。

38 李永平，〈一個游擊隊員的死〉，《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155。

39 李永平，〈第一顆石頭〉，《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81。

40 詹閔旭採訪撰文，〈大河的旅程：李永平談小說〉，《印刻文學生活誌》58號，頁178。

而李永平／敘事者決心離開婆羅洲，回到支那母親——在象徵上當然是中國，而非台灣——的懷抱，無疑也是一種背叛／背離／離棄。如前所述，英屬婆羅洲（後來則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州）所具備的殖民性與文化混雜、血統混雜，是一心追尋夢土中的純粹中國的李永平／敘事者難以接受的。然而當他離開婆羅洲，來到台灣這個「替代的中國」，卻又發現其正急速地墮落於帝國殖民的遺緒與資本主義的侵蝕。於是他寫了《吉陵春秋》與《海東青》，將自己囚困於漢字的圍城之中。換言之，李永平不僅狠心拋棄了生他養他20年的生母婆羅洲，同時也否定了陪伴他40年、並帶他走上文學之路的養母台灣。雨雪霏霏的壓卷作〈望鄉〉，即是對離棄生母、養母之罪的告解之作。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望鄉〉並非僅是張錦忠所描述的平行式的「兩個這鄉望他鄉的故事」。⁴¹它更是一則交纏著的「雙鄉寓言」，婆羅洲・台灣雙鄉的「源頭神話」。

〈望鄉〉以兩個軸線進行：一條是敘事者與朱鴿溯新店溪而上尋找已經滅絕的台灣原生種魚「庵仔魚」，這當然有著「溯源」的意味。另一條軸線是敘述中的婆羅洲童年往事：南洋小孩與「台灣寮」三名台籍慰安婦之間——當然還有其南洋母親的故事。小說中的「台灣寮」是一個神祕的地方，住著三個「肌膚皎白、年紀約莫三十、神態舉止看似外鄉人卻操得一口南洋最通行的廈門話的女人」，沒有人知道她們來歷，三不五時有乘黑頭仔車而來的馬來富豪鬼祟進出。好奇的大夥紛紛駐足偷窺。某日正在偷窺女人洗澡的敘事者（時年七歲）不慎被發現，意外的是這三個女人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將敘事者當作自己的孩子看待，餵他吃飯，幫他梳髮、洗澡，和樂融融如一家人。因此敘事者說：「我發誓：我永遠感念這三個女人！她們疼愛我，可也尊重我……我喜歡待在這三個來路不明、背後遭人指指點點的女人家裡，因為我覺得安心。她們讓我真正感受到女人的母愛是那麼的宏偉，那麼的安祥自在」。⁴²其中一個女人——月鶯，告訴敘事者她的真名與身世：她們來自台灣。16歲時，自稱「拓殖會社」幹部的日本男人以「招募隨軍看護婦到南洋醫院上班」的名義，將之

41 張錦忠，〈兩個這鄉望他鄉的故事〉，張錦忠、黃錦樹編，《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1997-2003》（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9），頁66。

42 李永平，〈望鄉〉，《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236。

誘騙（其實是被父親賣掉）到南洋當慰安婦。1945年戰爭結束，接收婆羅洲的英軍立即關閉慰安所，遣送日軍與慰安婦回國。月鶯和幾個姊妹帶著永久的印記，自覺無顏返鄉，選擇留下定居。然而由於求生困難，只得重操舊業——差別的是恩客從日本皇軍變成了馬來新貴。如前所述，她們被殖民／父權體制剝除了生育能力——這也使得她們失去了做為母親的能力。她們於是把敘事者當做自己的孩子看待。將無法遂行的母愛全部移置到這個南洋小孩身上。

固然，三名台籍慰安婦的母愛移置當然有其獨特的歷史脈絡。但在象徵層次上，李永平著眼的應是她們「無親無故的寬大母愛」——這也是李永平台灣經驗的象徵。她們餵南洋小孩吃生母為他準備的飯盒，並不妒忌，也煮味噌湯給他喝。「味噌湯」是個重要隱喻，它當然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殖民／南洋侵略有關，也意味著他／她們被侵略、被殖民、被動員的漂泊身世。敘事者第一次喝味噌湯：

我永遠忘不了那的一口的滋味，當時直想嘔吐出來，可是一抬頭，看見三姊妹站在跟前眯眯笑瞅著我，只好憋住氣，狠狠將它吞下肚，誰知那口怪湯一滑入喉，滋味卻變得美妙無比，於是我咬緊牙根又喝三口。多少年了，我喝味噌湯早已喝上癮囉，在我心目中那是可惡的日本最偉大、最可愛的發明！⁴³

三名台籍慰安婦的身世，便是一部日本的海外殖民史。1894年日清戰爭爆發，清廷戰敗，簽訂下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台灣於是成為日本在海外的第一個殖民地。同時，台灣也淪為被母國棄置的孤兒，產生一種王德威所謂的「遺民意識」。⁴⁴然而台灣人並未因此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日本人」。在「六三法」、「三一法」、「法三號」接連持續延長的情況下，日本內地的法

43 李永平，〈望鄉〉，《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頁234-235。

44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頁23-70。

律一直無法完全適用於台灣，台灣人只是日本帝國的二等國民。⁴⁵ 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戰事吃緊，日本殖民政府不得已創立「特別志願兵」的制度，台灣人首次被「賜與」服兵役的義務。⁴⁶ 同時，部分台籍女性亦被以各種名義徵召，送往南洋各地的「慰安所」。台灣人於是再一次地遭到母國棄置。從這樣的過程來看，三名台籍慰安婦所意味的除了是一種身世飄零，更是一種文化混雜的表徵。此外，她們同樣是沒有母國／被母國棄置的人。父親（中國、日本）帶她們來，卻無法帶她們回家。在這點上，原鄉在廣東、因父親移民而在婆羅洲出生長大的敘事者，與她們所具備的種種象徵實則有對照上的一致性。而當敘事者在月鶯姊妹母愛的鼓舞下，一口口吞下味噌湯——台灣不斷被棄置、被殖民的混雜身世——的同時，其接納的，不僅是月鶯姊妹的母愛，更是對於文化混雜的同情與理解。

然而，接受養母台灣的母愛，卻是對生母南洋的背叛。

漸漸有人開始說起閒話。在三姑六婆口中，敘事者於是成為台灣寮三名來路不明的女子合養的私生子。這無疑質疑／否定了生母的地位。而母親的淚使敘事者心慌：「為了向我媽表明心跡，為了讓全古晉城的人知道我最在意的是我的親生媽媽，於是我就狠起心腸，硬著頭皮，對月鶯阿姨她們做出那件殘酷的事」——敘事者回過頭來背叛養母台灣，向警察告發台灣寮裡頭的非法勾當。

敘事者以對養母台灣的背叛，掩飾了對生母婆羅洲的背叛。這是雙重背叛，也是雙重的虧欠。二者擇一，不管放棄何者都是對另一者的背叛，都是罪惡，都是苦痛。因為對敘事者而言，雙鄉是糾纏的。李永平將敘事者與台灣發生緊密關係的時代提前至他的童年、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經有了歷史的必

45 關於戰前「日本人」界線的包攝與排除，詳見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灣・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日本東京：新曜社，1998.07）。

46 關於日治末期日本在台軍事動員及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詳見周婉窈，〈日本在台軍事動員及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02），頁127-183。有關「志願兵」制度的文學作品，最具代表性者當數周金波（1920-1996）發表於1941年的日文小說〈志願兵〉（《文芸台灣》2卷6號，1941.09）。至於台灣作家到南洋作戰經驗的書寫，最重要的有陳千武（1922-）於七、八〇年代間所撰寫的〈獵女犯〉等一系列小說。陳千武從軍時活動地點多在印尼的婆羅洲。日本戰敗之後被遣送至新加坡的戰俘營。

然；同時，在空間上，也將與台灣產生依戀的場景從大學時代的台灣前溯到童年的婆羅洲，都是一種對於自己身上南洋性・台灣性交混、以及婆羅洲・台灣雙鄉的追認。其對台灣的認識，是透過南洋經驗；而他之所以能夠「回家」（婆羅洲・台灣），是因為台灣丫頭朱鴿的引路。在《雨雪霏霏》，透過敘事者之口，李永平從不吝於表現他對台灣風土歷史的熟知與感情，然而：

作品裡的那個「我」，甚至不用靳五這個名字，而直接用作者的名字。

《雨雪霏霏》裡頭那個「我」，跟台北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幾乎是與台北這個城市、或台灣這個國家融為一體了。在《雨雪霏霏》透過敘事者「我」，可以看出作者對台灣有著相當濃厚的感情，甚至不遜於對婆羅洲的感情。所以我現在覺得我更有資格寫台灣了，可是呢，我又不想寫台灣了，我要回到我的原鄉，我覺得我對婆羅洲有個責任。⁴⁷

作者在訪談裡表露的心跡，與〈望鄉〉裡的敘事者相當類似。然而，在今後的創作計畫裡，李永平並非透過背叛來掩飾背叛，而是透過懺悔、透過誠實面對而真正踏上回家的路。《雨雪霏霏》是「婆羅洲三部曲」的第一步／部作，第二步／部作《大河盡頭（上卷 溯流）》在2008年出版，第三部《大河盡頭（下卷 山）》也已在2010年出版。回到婆羅洲，便是回到故事的發生地。然而回到婆羅洲並不只是回到婆羅洲。在〈望鄉〉裡，敘事者在童年的婆羅洲經驗，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且唯有重新肯認自己的南洋性，才能重新認識台灣。我們可以這麼說：回到婆羅洲，不是排除與選擇，而是回到故事的源頭。而在故事源頭，早已是雙鄉相互滲透、重疊、雜揉。

六、結論

除了婆羅洲童年往事的追憶，〈望鄉〉的另一個軸線，是敘事者與朱鴿溯新店溪而上尋找已經滅絕的台灣原生種魚「庵仔魚」。新店溪的月光、台北的

47 詹閔旭採訪撰文，〈大河的旅程：李永平談小說〉，《印刻文學生活誌》58號，頁179。

霓虹、回憶裡下著冷雨的冬天……，這些敘述，不免讓我們聯想到1983年蘇芮演唱、紅極一時的〈一樣的月光〉（李壽全作曲／羅大佑、吳念真作詞）。這同時也是台灣電影《搭錯車》（虞戡平導演）的主題曲。《搭錯車》敘述眷村一位以拾荒為生的退休老榮民啞叔，拾回路邊的棄嬰阿美並將她撫養長大。後來，阿美意外成為大歌星，為維護形象，無法認拾荒的啞叔為父。啞叔因此深受打擊，抑鬱而終。阿美後悔然為時已晚，只能以歌聲表達內心的哀痛。《搭錯車》同樣也是一則「棄的故事」：棄嬰阿美因啞叔撫養得以長大成人，卻因對夢想的追逐，反過頭來遺棄／背叛撫養她的啞叔。筆者認為，李永平〈望鄉〉裡幾個細節的描寫，應該不是巧合。《搭錯車》於是成為〈望鄉〉——甚至整部《雨雪霏霏》裡的潛文本，而蘇芮演唱的〈一樣的月光〉的歌聲，則是隱然存在的背景音樂。一般論者多注意到小說裡提及的日本電影《望鄉》，認為李永平小說〈望鄉〉乃藉此題名發揮，卻沒留意在小說中敘事者已駁斥了「沒有墓碑」的台籍慰安婦以墓碑「望鄉」的虛妄性。我認為，台灣電影《搭錯車》，才真正能說出李永平心中那個埋藏許久的「棄的故事」。

論文的最後，不妨以《搭錯車》裡阿美在演唱會上獻給啞叔的歌〈酒矸倘賣否〉的上半個段落，作為另一個回家故事的起音：

酒矸倘賣無 酒矸倘賣無

酒矸倘賣無 酒矸倘賣無

多麼熟悉的聲音 陪我多少年風和雨

從來不需要想起 永遠也不會忘記

沒有天哪有地 沒有地哪有家

沒有家哪有你 沒有你哪有我

假如你不曾養育我 給我溫暖的生活

假如你不曾保護我 我的命運將會是什麼

是你撫養我長大 對我說第一句話
是你給我一個家 讓我與你共同擁有它

故事的最後，兩人終於抵達新店溪的上游，朱鴿卻消失了。然而同時，敘事者的對話對象，卻也忽然置換成他在婆羅洲的親妹妹——翠堤小妹子。忍不住向她撒嬌抱怨：

翠堤小妹子，妳看，朱鴿她不再理睬我了。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灣・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日本東京：新曜社，1998.07）。
- 王德威，《後殖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1）。
- ，《眾聲喧嘩以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10）。
- 李永平，《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2.09）。
- ，《迢迢：李永平自選集 1968-2002》（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08）。
- ，《大河盡頭（上卷：溯流）》（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8）。
- ，《大河盡頭（下卷：山）》（台北：麥田出版社，2010.09）。
- 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01）。
- 張錦忠、黃錦樹編，《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 1997-2003》（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9）。
- 黃信彰，《傳唱台灣心聲——日據時期的台語流行歌》（台北：台北市文化局、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籌備處，2009.05）。
- 駱以軍，《棄的故事》（台北：作者自印，1995）。
- 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01）。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02）。
-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企業公司，1998.01）。
- ，《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01）。
- 張貴興，《頑皮家族》（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01）。
- ，《群象》（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98.02）。
- ，《猴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11）。
- ，《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09）。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陳允元，〈蕨蕤的恥丘——窺視張貴興雨林圖象的「性」「獸」〉，《中國現代文學》9期（2006.06）。

周金波，〈志願兵〉《文芸台灣》2卷6號（1941.09）。

詹閔旭採訪撰文，〈大河的旅程：李永平談小說〉，《印刻文學生活誌》58號（2008.06）。

（二）學位論文

詹閔旭，〈跨界地方認同政治：李永平小說（1968-1998）與台灣鄉土文學脈絡〉（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三、電子媒體

伍燕翎，施慧敏訪問，〈人生浪遊找到了目的地——李永平訪談錄（上）〉，《星洲日報》（電子版網址：<http://tech.sinchew-i.com/sc/node/10>，2009.03.14）。

